

八十年代是情报专业人员大有作为的时代

刘 钦 智

编者按：美国著名的中国血统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刘钦智教授早年就学于密执安大学，现任西蒙斯学院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院教授及副院长。1979年乘她回国访问期间，北京、上海和福建等地图书馆学会邀请她作了多次学术报告。

今年刘钦智教授被选为第十二届密执安大学“最优秀校友”，获“最优秀校友奖”。在庆祝年会上刘钦智教授作了题为“八十年代是情报专业人员大有作为的时代”的报告。

刘钦智教授的这个报告，是针对目前美国图书馆界和情报界的情况讲的，但其中有些章节，如：分析电视和电子计算机这两项技术革命给图书馆带来的重大变革及对今后图书馆学教育、研究、技术发展趋势的展望等都有一定参考价值。特别是作为一个图书馆学专家，她不仅面对现实，指出了当前图书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而且鼓励图书馆专业人员要“勇于接受时代的挑战”，“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满怀激情地提出“八十年代该是我们奠定基础并使之不断发展的时候”，这些对我们很有启发。

感谢刘钦智教授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寄来这份内容丰富的报告。报告全文为十节，现选译其中七节发表，以飨读者。

自从密执安大学在一九六九年制定了住校校友计划以来，我始终怀着羡慕和欢欣的心情来参加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受到祝贺的少数幸运的优秀校友，完全有理由被称作图书馆与情报专业方面的领袖人物。正由于这一点，我为自己能置身于令人尊敬的专家行列而感到光荣，我更为自己能与杰出的雅可布斯先生同时获得“最优秀校友奖”而感到加倍的荣耀。每当我一回到安阿伯，怀旧之情便油然而生。

这里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我原是一个缺乏社会经验的外国大学毕业生，第一次远离故乡，周游了半个世界，满怀激情地寻求受教育的机会，最后在这里，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开导。

如果把过去二十年作为一个“空间座标”来看待的话，我们无疑会明显地感觉到，从八十年代起，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少有的大有作为的时代。不论在技术和经济，世界观和人生观，或是在日益发展的伟大社会的方式方法方面，我们都经受了种种风险。

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不断改变的社会准则的震动波所引起的在各方面出现重大和紧迫变化的时代。”（注1）

技术革命

美国在五十年代出现了两项重大的技术革命：电视和电子计算机。这两项重大的技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通信系统，它们在过去二十年内对美国图书馆和情报服务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这两项技术革命的结果，我们亲眼看到了情报时代的到来。图书馆作为“看门人”的传统作用迅速消失了；把我们当代的文化从传统的印刷文字改变为不断发展的，光辉灿烂的直观文化终于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从而实现了麦克洛汉的一句名言：“信息载体就是情报”。新的信息载体与以文字为基础的书刊资料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情报资料形成和产生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致使图书馆无法再以传统的方式来及时加以处理，存贮和传送。这就使我们经历了高度竞争的情报工业的诞生和变化。情报

• 原稿为英文本，翻译和节选都未经作者本人校阅。

工业的迅猛发展终于使图书馆难以做到的大量工作得以实现,例如重新处理情报,满足情报使用者特定的或专业的需要等等。

八十年代为电子和电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迅速扩展提供了新的领域。在信息学领域内,灵活的终端设备,光导纤维技术,通过数字传输装置直接播送卫星传输,电子邮件,无线电传真传送,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系统(CBMS),大规模数据库存贮,录象磁盘技术,高速印刷和照相等在未来十年中将为我们提供全面的,不断发展的机会。据报道,在不到二十张IBM—3850胶片上即可存贮国会图书馆目前收藏的18,500,000册图书。(注2)另据报导,上述国会图书馆全部藏书的信息,如通过人造卫星,在不到8小时内即可传输给全欧洲使用。(注3)最近由国立医学图书馆研制成的录象磁盘,效果很好,每盘磁盘能存贮10亿到100亿毕特的信息,所需成本很低。(注4)在成本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技术的能力却大大增强了。国际通信卫星组织1965年发射的第一代卫星只有50兆赫的可用频带宽度和240个双向电话电路,但每个电路的全年费用却高达3万美元。1975年发射的第五代卫星则拥有比第一代卫星大46倍的可用频带宽度和12,500个双向电话电路,而每个电路的全年费用却下降到700美元。(注5)通过电子仪器证明,成本费和可达性还可继续得到改进。反之,通过印刷和纸张,成本费和可达性情况却只会越来越糟糕。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情报的生成,转换和传输必将在八十年代发生急剧的变化。由于成本低廉和远距离—低敏度频带卫星网络的出现,当地电视站和海底电缆系统即可直接通过家庭对卫星广播而获得部分补充;家用电视将可用来显示来自中心联机数据库的文本。即使呆在家里或小规模的商业机构,价值低廉但效率很高的小型计算机也能使你与机读数据库取得联系。根据我们

现有的技术能力,我们可以同顾问,见不到面的学院同行以及情报专家进行实时联机通话。

远程图书阅览,远程文献检索和远程馆际互借活动肯定会急剧增加。实时可读付本参考(Real-time hard copy reference)和文件传送也将成为可能。在不太远的将来,一定会出现“电子图书馆”或“电信图书馆”,它们的到来无疑将比我们很多人所预计的快得多。在过去二十年内,由电视、广播,报纸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所引起的技术革新的速率是如此惊人,以致使很多图书馆员不能清醒地来估计它们在图书馆服务工作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八十年代通信技术所造成的变革速度肯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快得多。我们每个人都应认真来思考新技术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变革因素在情报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充分认识技术在未来图书馆和情报专业中所产生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未来图书馆和情报专业的生存价值完全依赖于新技术的发展。

向被剥夺了情报服务的人提供技术

最近几年里,电子学的革命性进展已使无线电通信成为情报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惊人变革对个人或以公共团体为基础的小型机构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但迄今为止,他们似乎对新技术的进展仍然一无所知,对这些技术最新的和潜在的应用也很少了解。他们经常得不到有效的情报服务。正如全国公民广播委员会(NCCB)在一次专题会议上所大声疾呼的那样,他们在国会,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中,被排除了对电子情报社会中的许多复杂问题作出决策的权利。1979年6月召开的这次专题会议(新的通信技术和情报技术及其在个人或团体中的应用)是该委员会专门为白宫会议提供材料的一次预备会议。(注6)毫无疑问,下列两类人之间的差距正在越拉越大:拥有大

量尖端情报又懂得使用情报技术的人和拥有少量情报或被剥夺了情报又不懂使用情报技术的人。情报是一种十分宝贵的国家资源。应用情报技术来获取这种资源决不能成为少数杰出人物和社会名流的特权，它必须有意识地为所有的公民谋取利益。我们必须很好地运用情报技术来为所有的公民谋取利益。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便脚踏实地地来纠正这种在情报占有上贫富不均的现象。

社会情报环境

我们已经进入了情报时代，半数以上的劳动力正在从事各种情报处理活动。（注7）国民生产总值整整有一半是与知识部门有关的，在美国国民经济中，每赚取一美元或花掉一美元都是生产和分配情报的一种直接的副产品。（注8）美国每年用于科学研究和研制的经费约为380亿美元。（注9）据很多情报学家估计，到1985年，世界情报总产量将增加四至七倍。（注10）情报爆炸已成为显而易见和不容否认的现象。

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化以后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国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各样的服务组成的，而这些服务又是根据异常复杂的，以情报为基础和资本密集的生产体系而形成的。（注11）很明显，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依赖情报和知识而生存的社会。理论知识既是进一步革新的源泉又是制定政策的良伴，因而它必然要发挥主导作用。（注12）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种经久不衰的热情，要创造和发展“智能技术”，正如哈佛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那样，在这个“工业化以后”的社会中，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种机构的构成将要经受激烈的和基本的变革。它们的服务方向“将通过提供专业和技术服务来体现，这种专业和技术服务又依赖于合作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注13）在工业化以后的时

代，一种更为灵活和面向团体的组织模式将取代官僚式的和等级森严的组织模式。

阿瑟·D·李德最近在为全国科学基金会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三个情报传输时期。（注14）第一个时期是面向学科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图书馆在向读者提供免费的重要情报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个时期（从50年代开始至60年代中期）是面向任务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在图书馆之外又成立了各种情报系统。第三个时期（从60年代晚期开始）是面向问题的时期。在此期间，用来解决各种尖端问题的情报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出现了许多边缘学科。为了保证顺利而有效地来流通情报，熟练的中间人成了最重要的因素。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迅速有效的情报传输。虽然研究团体都把重点放在科技情报的传输上，但科技情报的传输对各种类型的情报系统同样也产生了普遍的影响。第三个时期显然与我在上面提到的“工业化以后”的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上午正当我准备早餐时，我在“今日节目”中听到了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弗勒在介绍他的一本新书《第三次冲击》。他强调指出技术和经济力量的发展已达到这样的高度，它将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里从事研究工作和经商活动，他把这个家称作“电子家庭”。显然，除非图书馆挣脱第一个时期的硬壳，否则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并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

机会和挑战

我在这里为传统图书馆的未来描绘了一幅相当暗淡的前景。你们或许会为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感到奇怪，为什么不叫作“绝望的八十年代”，反而称之为“大有作为的八十年代”呢？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你们一定也已经注意到，我在这里选用的词是“情报专业人员”而不是“图书馆员”或“情报科学工作者”，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我始终认为图书馆只是构成我国整个情报环境的一个

组成部分，在八十年代情报界工作的人，凡是他们的工作领域和专业范围与“情报”一词有点关系的，都必须和谐地在一起工作，而不能各搞一套或互相竞争，从而建立起一个统一而有效的情报服务网。

在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挑战——教育研究，进修教育，管理，人员培训，通信联络的销售，与公众的关系以及立法等等无不面临着这些挑战。在今后日趋困难和复杂的年代里，我们必须共同努力，重新来安排我们的目标，重新来考虑我们的工作重点，重新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方式，在新的发展领域内，重新考虑如何使用我们的能源和其他资源。总之，我们必须重新担负起新的更加明确的职责。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就得不断提高我们国内的生产率，并为情报使用者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现在让我分别来叙述这些职责。

情报实践

处在目前的情报环境之中，我们在采访组织和情报来源的传输方面，除了必须具备传统所要求的工作能力外，还应使自己成为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我们必须利用各种技术来提高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也就是最大限度地使用我们有限的资源——工作人员，予算，空间和财务管理等等。我们还必须调查研究和预测情报使用者的需求，发展面向用户的服务和计划。我们必须经常地，有效地与我们服务的对象取得联系，交流彼此间的情况。我们必须不断地向公众宣传推广我们的服务工作。最后，我们还必须随时了解我们对手的情况。找出切实可行的方法来与他们竞争或者与他们共处。

我这里所谈的是指团体和个人间的复杂而多方面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共处”确是说来容易，做来难。作为开始，我们必须懂得如何使我们所在机构有效地进行工作；我们必须具备面向用户的服

务能力，但是，我们服务的真正价值常常是根据情报使用者的看法来作出判断的，而不是由提供资金的人来判断的。当大多数公民还没有把图书馆看成是检索情报的重要场所时，我们又怎能自称图书馆改善和提高了一般公民的生活水准呢？因此，我们必须在公众中不断宣传我们的服务工作，否则，我们就会被他们看成是多余的，可有可无的人。

这些行动计划涉及的范围很广，它包括先进的通信技术，科学的管理方法以及行为科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具备这方面的足够的理论知识呢？要知道，这方面的学科知识正在为一系列革新和创造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曾经提到，技术在“工业化以后”的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特色。我们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懂得如何在情报服务中来运用这些技术呢？在这些学科领域中，新的进展正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早先掌握的专业知识实在是太不敷应用了，进修教育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为了避免使我们原来的专长变得陈旧过时，我们就必须充分重视进修教育。除了通过相互补充不同学科知识，搞好进修教育和自学技术外，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还应培养和提高工作人员在管理、组织心理学和人事心理学，经济学和其他有关领域的的能力。如果我们敢于迎接这些挑战，勇于挑起重担，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获得累累硕果，八十年代也肯定会成为情报专业人员大有作为的时代。

与以往相比，我们在未来十年中将有更多的机会学习边缘学科，并把我们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样，我们与整个社会的相互影响就会进一步得到加强。

教育与研究

生活在八十年代的情报环境中，不断扩大学科知识领域必然会对教育和培训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必须学习革新和创造的理论知识。现在是时候了,图书馆员的培训工作不能只是强调在实践上“如何”提高教育水平或达到“什么样”的教育水平,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要提高教育水平。只有认真考虑“为什么”要提高教育水平,我们才能培养创新精神,逐渐形成和发展新的体系,并以此来接受层出不穷的新挑战。情报领域的扩大迫使我们必须不断地扩展专业课程,并通过学习其他学科知识来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在情报专业方面,我们要更加重视管理,通信,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其他新技术以及一些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如统计方法和面向问题的方法论等。总而言之,我们图书馆学校的全部课程都必须体现客观事物不断变化的成果。

同时,我也把图书馆看成是一个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提出这一论点的理由是,有些人把“图书馆”看成是一个“不体面”的字眼,他们主张“抛弃”图书馆这个概念。图书馆作为一个传统的基地,我们自然不应抛弃它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问题在于如何加以改进和重建,以便使我们未来的专业人员能够和谐而有效地与整个情报领域的其他专业人员一起工作。

当然没有必要使图书馆和情报学的教育计划变成专门培养高级情报技术人员的计划,例如计算机操作人员,程序编制人员或信息载体生产人员。我们的培养目标应当十分明确才行,我们一系列的培养目标都必须根据情报环境中的各类工作,以及它所要求的工作标准 and 专业化程度来很好地加以鉴定和识别。我认为这既是图书馆和情报教学人员的责任,又是他们大显身手的绝好机会。教育我们专业的未来一代,使他们能够卓有成效地来对付未来的挑战,显然是我们不容推卸的责任。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一笔投资。通过设置新的教育课程,掌握相互交叉的边缘学科,我们就会具备比以往丰富得多的知识。

由于边缘学科领域正在不断深化和扩大,我的专业领域也将变得更加令人振奋并能适应多方面的需要。

我在上面曾经间接提到情报工作人员进修教育的必要性。情报教育人员无疑将在这一领域中担负起更加繁重的任务。内容不断更新的教育课程和教学计划一直被认为是进修教育的主要手段。不过,各种形式的短训班(从为期一天的研讨会到连续举办几星期的训练班)也应列入我们的教育计划,我们可以聘请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为工作性质相近的专业人员讲授相关的专题。大力促进这方面的工作是情报教育人员,情报专业人员及其组织机构的共同责任。对那些具有创新思想和真诚信念的情报专业人员来讲,进修提高的机会确实很多,当然,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我们已经亲眼看到进修教育的课程目前正在不断增加。虽然进修教育所需的费用要比正规的学术团体或专业学会多三至四倍,但只要进修教育的计划是适时的,并能满足情报专业人员的迫切需要,它们就会日益繁荣兴旺起来。反之,如果课程的内容很成问题,即使不收任何费用的进修计划也是站不住脚的。时间就是金钱,而情报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内容适用的情报就是一种销路很广的商品。这里也同样存在着一个经济权衡点的问题,超过了这一权衡点,进修教育计划就会在经济上失去生存的条件;但是,进修教育的真正生命力还在于使它始终保持收费少而成效大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有远见卓识,富于创新精神并具有超然的领导能力。

历史证明,科学研究最终要导致新的学科知识的诞生,因此,促进和扩大专业知识的基础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一门学科领域的研究活动的不断深化也是用来判断专业是否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准。大量事实表明,图书馆专业至今仍处在相当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它确实为某些具有一

定研究能力和兴趣的人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机会。

图书馆和情报专业充满着各种各样长期被人忽视的基本问题。这种现象必须立即加以纠正。新的生气勃勃的情报环境具有极其广泛和复杂的范围，它包含着许多有待探讨和研究的课题。现在是进行具体规划和行动的时候了。不然的话，专业图书馆和情报研究就会受到以谋取利润为主要目标的商业研究公司的更大侵蚀。

职业的选择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在谈论八十年代为图书馆和情报工作者，情报教育人员 and 研究人员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听众中有很多青年学生，你们代表了处于激烈竞争中的我们专业的未来一代。你们对图书馆学校新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了解的。我对八十年代情报环境的评述或许会使你们对自己专业的未来大失所望。去年秋天，我在一次演讲中曾经提到，图书馆同其他情报机构相比，它在满足情报使用者的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会后，好几位图书馆院校的教授对我的看法表示异议，他们认为我这种说法会影响听众中图书馆院校学生的情绪，使这些满怀希望，渴望学好本专业的学生丧失信心，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当时感到，现在仍然认为，我们在争取美好未来的战斗中，最理想的战术是从一开始就对我们自己的处境和力量作出准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并能全面而透彻地了解我们对手的优势和能力。为我们的学生描绘一幅无限美好，但实际上是虚假和不切实际的前景，其实是最有害于他们的。我还记得，在我说出这些看法后，听众中有好几位学生立即站起来，公开表示赞同我的观点。我希望自己今天的演说也能达到相似的目的。要知道，我们今天正生活在一个严峻的，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但是这个世界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挑战和

机会，只要你们富于创新精神，愿意承担风险，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在人力，物力的使用上又注意精打细算，你们就一定会获得成功。你们在满足情报使用者的需求时，必须热情周到，讲求效率，富有革新精神。图书馆工作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但你们决不要放弃新的职业训练，一旦机会到来，你们的专业知识，工作背景和个人爱好就会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可供选择的情报职业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图书馆工作人员，情报管理人员，情报顾问，情报系统分析员，信息载体专家，情报推销专家，缩微资料技术人员，记录管理人员，数据库管理人员，技术情报作家和编辑，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教育人员，情报培训专家，情报经纪人，图书馆推广员以及情报商业经纪人等等。八十年代为情报人员提供了大量的机会，除了有限的职业道路外，你们必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职业选择。尽管在情报领域中充满了困难和挫折，但它仍然是一个令人响往的，很有意义的工作领域。你们一定会同意我这个观点吧。

二十年前，我是密执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毕业生。我的未婚夫是核子工程学博士，我们两人在专业上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当时图书馆学和核子工程学无论从内容或研究范围来看都是两门性质截然不同的学科。二十年后，我们作为处在“情报藩篱”两边的专业人员，却象一支队伍里的亲密伙伴一样，肩并肩地在一起工作——他是情报的制造者和使用者，而我则成了情报的中间人。我的职业经历了一段令人振奋的转变时期。在我看来，它就象一个可以切割成很多碎片的大园周。我所从事的多方面的工作，例如图书馆员，图书馆行政管理人员，图书馆教育人员，研究人员，顾问，著作家和其他种种职业就是这个大园周的一些“碎片”。在图书馆和非图书馆领域内，我永远只是一名学生，因为在这些领域内，我无时无刻不在学习新知识，接受新事物，无论何时，只要我认为合

适,我就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我正是以这种笨鸟先飞的方法,通过持续不断的学习,使自己的“知识园周”变得更加丰满和充实。

我在上面谈到了自己对专业人员企图“摆脱”图书馆的态度,同时也表达了我这种做法为什么认为是弊多利少的理由。我之所以这样看的另一个理由是同我本人的经历和成长分不开的。中国有句古语“饮水思源”。不管八十年代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是多么令人向往,我们都应永远记住,这些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我们的先辈——美国图书馆界创业时期的巨人们所奠定的基础工作的副产品,八十年代该是我们奠定新的基础并使之不断发展的时候了。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笔宝贵的遗产,并且满怀激情地向往着未来,我们就应当勇于去接受时代的挑战,充分利用未来十年为我们提供的一切机会。

(姜炳沂译)

注 释

- ① 约瑟夫·贝克:《图书馆,社会和技术变革》(载

《图书馆趋势》27: 409, 1978年冬季刊)

- ② 刘易斯·M·布朗斯可姆:《情报:最终的尖端》(载《科学杂志》203: 143, 1979年1月12日)
- ③ 赫伯特·D·贝宁顿于1979年11月16日在白宫会议上的讲话:《面向社团和专业机构的图书馆和情报服务》
- ④ 罗莎·林:《电信图书馆:通过卫星的图书馆服务》(载《专业图书馆杂志》70: 363—372, 1979年9月)
- ⑤ 同上。
- ⑥ 白宫图书馆和情报服务会议:《新的通信和情报技术专题会议摘要》。(美国全国公民广播委员会起草)
- ⑦ 阿瑟·D·李德:《跨进门槛进入情报时代——对情报活动的展望》(《向全国科学基金会的报告》1978年1月)
- ⑧ 彼得·德罗克:《中断的年代》(1969年版·P·263)
- ⑨ 阿瑟·D·李德(见所引著作)
- ⑩ 乔治·安德拉:《1985年的情报:情报需求和情报资源的预测研究》(巴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 1973年)
- ⑪ 丹尼尔·贝尔:《工业化以后的社会的到来:一个大胆的社会设想》(纽约, 1973年)
- ⑫ 克劳斯·莫斯曼:《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在工业化以后的社会中能发挥作用吗?》(载《图书馆》28: 229—234, 1978年)
- ⑬ 阿瑟·D·李德(见所引著作20—26)
- ⑭ 刘钦智等:《公民索取情报的几种模式:英国最新调查研究》(向白宫会议提供的执行局报告摘要)

北美洲的亚洲图书馆

根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在北美洲存有中国书籍的大学图书馆共有六十六所,联邦政府图书馆存有中文书籍的有六所,公共图书馆七所,其它个别机构的十三所(地区性的小型图书馆不计在内)。

中文书籍的存储,在北美洲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较早收集中文书籍的有耶鲁大学,始于一八七八年。哈佛,一八七九年;加州大学(柏克莱),一八九六年;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二〇年;夏威夷大学,一九二五年;普林斯顿大学,一九二六年。

根据统计,北美洲中文藏书量共有3,920,472册。其中美国国会图书馆拥有404,560册,哈佛燕京图书馆330,150册,普林斯顿

大学213,864册,芝加哥大学200,052册,哥伦比亚大学196,105,康奈尔大学195,071册,加州大学(克柏莱)173,755册,耶鲁大学161,856册,密西根大学150,067册,史丹福大学150,009册,加拿大卑诗大学133,949册……

这些亚洲图书馆的中文书籍藏量,阵容强弱不同,古典及现代书籍均丰富完备的有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图书馆,富于近代著作及期刊杂志的有史丹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富于古典著作的有普林斯顿、芝加哥及密西根大学图书馆。又各图书馆之间,有交换借阅书籍及期刊的合作计划,以促进学术研究。

(节自叶嘉莹:《北美汉学研究概况》)